

目录 | Contents

难忘域外生涯

裘法祖：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3
师昌绪：难忘留学生涯，难忘回国历程·····	8
戴复东：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记事·····	14
翟中和：在国外学习与工作的日子·····	27
刘业翔：充实的星期天 ——挪威留学杂忆·····	32
潘君骅：留学苏联·····	37
黄胜年：俄京立雪 ——忆我在列宁格勒大学的留学生涯·····	42
杜祥琬：难忘在苏联的留学生涯·····	58
叶培建：留学瑞士·····	64
李焯芬：留学加拿大的一些回忆和体会·····	71

忆母校

陈梦熊：我的大学时代 ——回忆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	77
李荫远：西南联合大学颂·····	85
王补宣：回忆西南联大，感悟人生·····	87
陈灏珠：在流亡大学读书的日子·····	92
陈星旦：抗战中办起来的“中央技术科” ——我的高中学习阶段·····	98
王梓坤：青原山求学记·····	102
黄胜年：忆我的母校上海中学·····	106
张锡祥：军校生活有感 ——“西山坡”的回忆·····	113
程泰宁：我的母校 ——师恩难忘、同窗情深·····	118
刘宝镛：天翻地覆的初中成了人生的开始·····	124

杜祥琬：母校礼赞	
——回忆开封高中·····	129
王梦恕：蔡家坡	
——我生命的航歌·····	133
张钟华：我的初中母校·····	139
吴硕贤：中学的回忆·····	142

求学之道

高 鸿：一篇文章写了 34 年·····	149
谢家麟：我怎样决定了一生的专业方向·····	153
陈士橹：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159
李 珏：求索之旅	
——我的地质情缘·····	163
许学彦：我的成长之路·····	171
王德滋：科学人生的四次抉择·····	179
沈自尹：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的“四悟”·····	185
吴新智：影响我人生轨迹的几件事·····	192
朱伯芳：勤奋、求实、自强不息·····	198
潘镜芙：我的成功之道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学习、再学习·····	203
钟 山：尊重实践，协同攻关，坚韧不拔，高峰可攀·····	208
柳百成：面向国家目标、站在学科前沿	
——我的成长之路·····	214
陈俊亮：我的几次科研转型·····	220
滕吉文：穿越地平线	
——探索地球内部奥秘的人·····	225
廖振鹏：一位研究生导师的点滴体会	
——与年轻教师谈谈心·····	234
赵 煦：立足现实，自主创新助成功·····	244
严加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251
宋湛谦：我的成功三要素	
——执著勤奋，抓住机遇，家庭影响·····	256

难忘域外生涯



简介：

1914年12月6日生于浙江杭州。2008年6月14日逝世于湖北武汉。外科学家。1939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982年获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主要成就：

从事外科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逾65年，是推动中国腹部外科和普通外科发展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器官移植外科主要创始人。20世纪50年代开展对肝硬化引起的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创建了“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70年代在中国最早开展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实践的肝移植研究。近十多年来自体外牛胆汁中研制培育出“体外培育牛黄”，2003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985年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2000年接受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奖”。2001年被中国医学基金会授予“医德风范终身奖”。

裘法祖：

坐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教室里

1937年2月，我开始在德国攻读临床医学(医科后期)，前后共三年，1939年冬毕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需要大批医生，因此，医学学制由一年两个学期改为一年三个学期，这样，就等于缩短了一年学习时间，我遂于1939年冬比在国内的同班同学提前一年毕业。

德国临床医学的课程与国内的课程不很相同，三年内要学完14门必修课，方可参加毕业考试。这14门必修课是：病理学、药理学、微生物和卫生学、局部解剖学、病理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神经精神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性病学和法医学。由于上课的地点分散在不同的医院或研究所，我和同来德国学习的过晋源同学各买了一辆旧的自行车，在短短的课间休息时间，赶着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上课。例如早晨第一课在内科学院听课，接着就要赶去病理研究所听课。好在这14门必修课的听课和见习时间完全可以由学生自己来安排，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散安排

在三年中的八个学期中,我们才得以顺利完成上述所有课程的听课和见习。

临床学科的上课形式完全不同于国内,不是“填鸭式”的,而是“启发式”的,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例如上外科的第一课,老师先介绍了几本教材,供学生阅读参考,接着就以示范的方式授课。国内老师的授课是按教材系统地讲授,只见书本,不见病人;而德国则是联系典型的病例进行示范授课。往往今天是一位胃癌病人,明天是一位颅内肿瘤病人,而后天又是一位上肢骨折病人;老师简述病史,提示 X 线片,也可能就在课堂里施行复位。总之,要学生自己去阅读书本,自己去思考,上课只是示范一些典型常见病例。每次上课要提问四个学生,问答一些基本知识。每个学生在一个或两个学期中上完了一门课程,就可取得一张听课证明,等到 14 门课程读完,就可取得 14 张听课证明,可以申请毕业考试。学生如果不勤奋,或不去上课,就无法报考,只得延长学习时间。我遇到几个德国同学,已经读了五六年,还未读完,一年一年地拖下去,人们都称他们为“老学生”。

德国的大学里流行着一句话:大学生自由。也就是不但学习时间的长短由大学生自己来掌握,而且可以转到其他的城市学习,例如柏林大学的大学生可以转到慕尼黑大学来继续学习,也就是德国北方的大学生可到德国南方来读书,或者相反。不少大学生喜欢这样转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和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上临床医学课的场面。讲课的老师都是各学院或研究所的第一把手、教授或主任。他们都很讲究仪表,穿着熨得平整的白大褂、白长裤、白的领带,脚蹬白皮鞋,后面跟随着的一大批助教、讲师,一样是衣着整洁,也同时站在教室的两边听课。大学生并不需起立致敬,常是用手敲打桌子表示欢迎;如果对老师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学生就拖擦鞋底来表示。记得有一次,第一内科学学院院长、血液病著名教授来上课,他白大褂口袋中的电筒还亮着,学生就拖擦鞋底表示有意见,当时那位教授搞不明白,幸而一位助教及时提醒,他立即关闭了电筒,学生则立即敲打桌子,表示高兴。

著名教授上课时,庞大的梯形教室内便座无虚席,连站立的空间都满了。记得 1937 年世界著名的整形外科 Lexer 教授上课时,就如歌剧院一样的场面。Lexer 教授在上课时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外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这句话到今天还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并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和过晋源学习非常勤奋,上课时总抢着坐在第一排。寒暑假也不休息。三年中我们没有去旅游,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假期中,上午都去医院见习,下午就准备博士论文课题,极力争取按时完成所有必修课程的听课和见习,按时报考、按时毕业。

三年的刻苦攻读我顽强地挺过来了。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惊奇自己竟有如此持久的动力。特别在最后一个月考试阶段,我经常失眠。由于我的住处离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广场很近,每晚在睡前就去那里跑步一圈,这样我才得以入睡几个小时。

作为外国留学生,在德国可以享受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即所谓 Rigorosum,也就是写

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的考试,就可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时,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我和过晋源决定放弃这种优待,要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德国的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德国的国家考试非常严格,都是口试,分四人一组进行,必须在一个月中考完上述的 14 门课。每门考试要半天甚至一整天的时间。例如病理学考试,上午口试,先考问人体病理标本,继而要看五张病理镜片,作出诊断;下午还要自己做一个尸体解剖。1939 年 9 月,我在一个月里完成了所有 14 门课考试,除了 2 门课是“Ⅱ”(病理学、儿科学)和 1 门课是“Ⅲ”(药理学)外,其他 11 门课都是“Ⅰ”,因而获得总成绩“Ⅰ”(最高分),高频率的考试使我疲劳到极点,体重也减轻了 5 公斤。随后,在同年 11 月我再参加了博士学位答辩。由于我的病理学博士论文在 1938 年、1939 年两个暑假期间已完成,因而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答辩。

外国留学生在德国读博士学位不用参加国家考试,只参加优待的学位考试“Rigorousum”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的情况,当时这在国内许多人是搞不清楚的,以为都是“医学博士”,而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只有通过了国家考试,才有资格获得医师执照,在德国可以做医生。因此,如果现在我回到德国去,仍然有资格做医生。另外,我在 1945 年 12 月获得了德国“外科专科医师”的资格证书,这是不容易获得的职业地位。

我的博士生导师 Max Borst 教授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德国政府授予他“国家顾问”(Geheimrat)称号。他身材不高,很稳健,经常戴一条红色领带。他撰著的《病理组织学》堪称经典,有几个不同文字的译本。他热爱古典音乐,还担任一个医生交响乐团的指挥。Borst 教授性格开朗,富于幽默。医学生都知道国家考试中的病理学考试特别严格,考试中要看五张病理镜片,并作出诊断。这对一个医学生来说,确实是困难的。因此,在病理研究所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在考试前去找一位老技师,他的身材有些像 Borst 教授,给他 5 马克,就可以拿到五张镜片和诊断;在考试时也由这位老技师递给 Borst 教授这五张镜片。1938 年,从另一个城市转来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参加国家考试前也去病理研究所寻找那位老技师。恰巧在研究所的大厅里遇到了 Borst 教授本人,这个学生认为他就是那位老技师,就给 Borst 教授 5 马克,Borst 教授接受了,也给了这个学生五张镜片。第二天,我们上课时,Borst 教授一开始就说,在座的哪位同学,我要还他昨天付我的 5 马克。这件事引起了整个教室的学生长时间敲打桌子,表示高兴和赞扬。我今天回忆起当时的场面,仍然不禁要失声大笑。不幸的是,Borst 教授 1946 年因车祸去世。1979 年我访问德国时,见到了 Borst 教授的儿子,汉诺威(Hannover)医学院的著名胸心外科教授,通过他我到慕尼黑拜访了 Borst 教授夫人,我的师母,受到她的热情款待。

在德国三年的临床医学学习时期,最使我不高兴的是同学们认为我们是日本人。记得有一次,学生会组织去慕尼黑郊区一个温泉地区参观,晚上开会时我和过晋源进入会场,大家喊着:“欢迎日本人!”当然,我非常不高兴,我鼓起勇气走上台阶说:“我们不是日本佬,我

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也能够在慕尼黑大学留学！”霎时，会场一阵寂静，紧接着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今天，祖国强大了，富裕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只有我们老一辈的留学生才有这样的亲身体会！



接受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颁发联邦德国大十字功勋勋章(1985年)

做人要知足
做事要知不足
做学问要不知足

裘法祖
二〇〇四仲春



简介：

1920年11月15日生于河北徐水。金属学与材料学家。1945年获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学士。1949年和1952年分别获美国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硕士学位和欧特丹大学博士学位。1952—195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回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主要成就：

中国高温合金奠基人之一及学科带头人。领导研制出中国第一代航空发动机用铸造镍基多空涡轮叶片并被广泛用于飞机上。研制出的一系列高温合金和高合金钢具有开拓性。主持了中国有关材料规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及国家大科学工程的立项或评估,向国家提出并被采纳多项建议,人称战略科学家。

师昌绪：

难忘留学生涯,难忘回国历程

1945年我毕业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工作三年后,1948年留学美国,1955年返回国内。先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罗拉矿冶学院读硕士(1948年9月—1949年5月),而后在欧特丹大学完成了冶金博士学位(1950年2月—1952年6月)。读完博士以后,本应回国,却因朝鲜战争未能成行,不得已在麻省理工学院找了一个 Research associate 的职位从事研究工作三年。与此同时参与了争取回国的斗争,于1955年6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出国留学缘于偶然

我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庭,虽然属于书香门第,但是无力供子女上大学,只能读到中学毕业。为此,我考入了著名的保定师范学校。师范毕业后,保证可以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这就是我当初的抱负。1937年抗战爆发,我随家人南下,进入国立第一中学,仍然是师范班。在师范毕业的那一年,重庆教育部突然来了一个公文指出:凡是不愿教书的同学可

以转入程度相当的职业中学或高中。在这种诱惑下,我便转到国立一中一分校高中部,只读了半年就算高中毕业了,高中毕业就可以升大学,否则要教三年小学才能上大学。

1945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国内装备最好的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从事炼钢的工作,那里聚集了国内冶金界的精英;1946 年教育部招考公费留学生,厂内多数青年都跃跃欲试,在这种气氛下,我也动了心,在没有任何准备下仓促应战,发榜以后我收到的通知只是取得了自费留学的资格;所谓自费留学资格就是可以用法币按官价的汇率购买规定数量的外币。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根本不可能用工资所得购买足够的外汇,因此我根本没有理会这件事。1947 年到了鞍山钢铁公司,这时国民党占领区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以致只要以里市卖掉 10 美元,就可以官价汇率购买上 1 000 美元的外币。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费留学也就可能了。特别在鞍山解放后,辗转回到北平,看到北平“反饥饿、反迫害”游行时有发生,入夜军队调动频繁,我就想先到国外学习几年。于是我利用在 1946 年取得的自费留学资格,通过友人取得了美国两个学校的入学证:一个是处于五大湖区克利夫兰的大学,另一个是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后者收费较低,每学期学费只收 65 美元,而且这个学校是美国二大独立矿学院之一,与我的事业结合得比较紧密,于是决定去那里上学。持证到北平美国驻华领事馆,没有料到遇到了一位年长女士,讲话很快,我一句也没听懂,于是她劝我先念两年外语。此时有人告诉我,上海领事馆容易通过,于是我绕天津乘船到了上海,果然一次通过,而后乘车到南京教育部买外汇,办手续,于 1948 年 8 月乘麦格将军号运输舰,经香港、吕宋与关岛,用了三个星期到旧金山。船上多是到美国留学的,有去读研究生的,也有上百名由教会送去上大学的,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倒也不寂寞,船上绝大多数人都说南方话,有人见我说北方话就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是河北人,那人便说:“唉哟,你们北方人还有留学的呀!”说的人可能无意,但当地我却感到很刺耳,永生难忘。

留学期间的见闻与感受

我在美国旧金山上岸以后,办完手续便乘“灰狗”日夜兼程到了学校所在地罗拉(Ralla, Mo),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种族歧视。罗拉是一个约五千人的大镇,又是高等学府所在地,但是公共汽车座位却分前后,白人坐在前几排,后面几排才是黑人坐的地方。娱乐场所的厕所也“黑”、“白”分明。当时美国南北划分,据说是以密苏里州首府哥伦比亚为界,罗拉位于其南,歧视黑人的现象依然存在。

9 月开学,次年 5 月毕业。我的硕士论文为真空冶金,形成了一项专利,并得了一个奖。这时南京政府已无力照顾我们这些留学生了,在罗拉的十几名中国留学生中,有的在完成硕士学位以后就回国了;我和另外几个人则拟继续完成博士学位。为了继续生活下去,限于美国法律,又不能在美国找正式职业,只能打小工挣钱,于是北上到了芝加哥,最后到美国农业大州明尼苏达的一个叫 Blue Earth 的小镇,找到一份装罐头的工作,每小时 0.75 美元(当时

法定最低工资)。我日以继夜拼命干活,挣了几百美元。9月开学后,又注册矿冶学院博士生,选修了几门课程,同时到处申请有奖学金的学校,终于在欧特丹大学申请到一个研究助教的位子,主要为完成学位论文而做研究工作。

读了两年多(1950年2月16日—1952年6月),换了三位论文导师。先是从师 B. Lement 副教授,论文题目是《钢的回火脆》,不到半年,导师因思想“左”倾被迫辞职;接着我师从以研究合金相著称的当时的系主任 P. A. Beck 教授,我到他那题目组后,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即电子显微镜等膜技术,但刚刚得到了些结果,他就调到伊利诺大学去了,当时他要我同往,我没答应,于是我又师从了一位新系主任 E. Peretti 教授,做有关砷的研究。这是为化合物半导体打基础的研究工作。砷有剧毒,又容易挥发,工作不久,我便鼻子流血不止,险些酿成大难。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基础课要求严格,如在欧特丹大学要读七八门课,在论文答辩以前,还要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我主攻冶金学,副科为工程力学,都要通过笔试和口试;此外,还要求掌握德、法两门外语,只有各项都及格后,才能列为博士学位的候选人。

在读博士期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移民局扣压了我的护照,虽几经努力仍不能回国,我不得不在美国找一个正式的工作。于是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经过国际著名金属学家柯恩(M. Cohen)教授的口试与笔试,于1952年6月至1955年6月,在那里整整工作了三年,职位是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既承担研究任务,又可选修各种课程,自由度较大。在这三年里,我一面开展研究工作,一面争取回国。

柯恩教授在美国金属材料界有很高的声誉,是麻省理工学院十几个“学院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之一,当时他承担海、陆、空及原子能各方面的课题。我所从事的超高强度钢研究来自美国空军基地,代号7124。在课题名下还有一名博士生和一名技术员。通过系统性研究,由钢厂开发出一种超高强度钢(300 m),主要用于飞机起落架。此前不时发生起落架断裂事故。超高强度钢问世以后,情况有所改善,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院主持下,相关技术推广到我国,超高强度钢成为当前我国航空工业的支柱材料之一。在同一课题下,还开展了马氏体相变的理论研究,即马氏体恒温转变,这一现象是苏联人库尔莫之夫发现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现象,在柯恩教授支持下,我在冶金系地下室,从冶炼到加工成样品,而后测得实验数据,再写成论文发表于AIME的权威杂志上。在这三年里,我以勤奋和善良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许。20世纪90年代中我访问宾州大学时,一名6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的教授见到我惊呼:“原来你就是师昌绪啊,你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后,我们经常谈起你!”21世纪初,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黄培云院士访问母校时,又有好几个人问起我的情况,他颇感诧异:“怎么过了半个世纪,人们还对你念念不忘?”实际上我在工作上并没有突出的成就,只是工作勤奋,待人热诚给人印象深刻而已。

争取回国 忠心耿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所有留美学生的护照都被移民局收走,以防中国留学生回归祖国。我原本想读完博士以后就回国的,而且已受聘于北泽大。为此,我曾企图借道第三国再回中国,曾发信到印度、瑞典及巴西,在印度我的欧特丹大学同学 Das Gups ta 博士的帮助下,我在印度某工学院谋得一职。他发函印度驻美使馆帮助我办理了赴印手续,但是到美国移民局办手续时,移民局官员明确指出:“只要你企图离开美国,我们就认为你要返回赤色中国”,因此经第三国回国之路也被堵死了,我这才下定决心在美国谋求一职。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在四川和鞍山的同事张兴铃和从华盛顿大学来此工作的林正仙,我们三人在波士顿租了三室一厅的宿舍。不久,在西北工学院比我高三班的李恒德也来波士顿商谈有关争取回国事宜,他和张兴铃较熟,都是留学科协的积极分子。从此,我便加入了集体争取回国的斗争。1950年7月便在大西洋城附近的 Medfand 营地办一个十多人的夏令营讨论回国斗争的策略,最后得出结论:首先应将争取回国公之于世,否则便会被移民局各个击破,随时以“非法居留”罪而被逮捕,因为每个人都没护照,实际上已有几个人受到这种遭遇。二是要和国内取得联系,请求帮助,否则可能毫无效果,移民局可能完全不予理睬。

自此,争取回国有了方向和目标。李恒德是核心人物,他不但与留学生有密切联系,和同情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有交往。作为争取回国的积极分子,我除了致力于研究工作外,几乎所有时间都消耗在回国斗争上,经常跑纽约、费城和华盛顿。这一斗争中的有些活动还是很危险的,如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上签名,我曾持信到芝加哥找人签名,芝加哥是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杂居的地方,一不小心,便会惹来杀身之祸,罪名是和赤色中国有联系,我们拟好给国内的信以后,如何送达是更大的难题,其中途径之一是利用我和印度驻美使馆过去曾有过联系,再次请他们转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请他转交国内,几经周折,签名信终于顺利地交到国内,成为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国向美国要求释放回国留学生的证据之一。为了争取更多人的同情,我们不但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而且还写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呼吁善良的美国人给予舆论支持。为此,我们购入了一台卷筒式油印机放在波士顿住地,我们的宿舍成了发布消息的枢纽。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了,会议的主题本来是解决朝鲜与越南问题;但是会议上中国的黄华大使却根据中国留美学生的几封来信提出了要美国释放在美的留学生,而美国则提出以扣留在中国的十几名飞行员为交换条件。这一举动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轰动,几乎天天有广播,大谈中国留美学生与在华俘虏的交换问题。首次刊登此消息的是波士顿环球报对张兴铃、林正仙和我三人的访问,并在头版刊登了照片,说什么“美国培养的五名专家要返回赤色中国”,这五名是指除我们三人之外,还有水利专家汪闻韶、化学专家梁晓天。在照片下面的注释说我们愿意和入侵中国的航空员交换,其实当时我们严词拒绝交换,因为我们不是对等关系,他们是入侵的犯人,而我们是留学生,回国是正当要求。可见资本主义

国家的媒体是根据其需要而信口开河的。此时，我们顾虑到应该趁热打铁，加强攻势，有人建议应广泛宣传，把我们印好的几千封信散发出去，但是如在波士顿寄出，显然是由我们五个人干的。一天晚上，我提着两个大箱子到波士顿的火车站，约好由在纽约的两个同学关允庭和王振通接应后在纽约散发。上车不久，一位年长的列车员便问我为什么要回国？我纳闷他怎么知道我要回国，但我仍镇静地回答了回国孝顺父母、娶妻生子等。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波士顿《基督教箴言报》刊登了对我的专访照片，真是有惊无险。

我争取回国的事一直没向科恩教授汇报，他看到报纸以后才追问我到底为什么要回国，是嫌职位低，还是嫌工资少？我的回答是：“都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多得是，而中国需要我，我应该回去；而且父母年迈，我必须回去。”教授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他回答说：“如果有关方面要征求我意见的话，我就说有利于你的意见。”紧接着美国联邦调查局两个人还追问了我一番，我以要孝顺父母、娶妻生子搪塞了事。不久，美国政府公布了包括我们三人在内的76人名单，同意我们回国。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作准备，我们于4月乘火车，搭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到香港，临上岸前，美国政工人员还对我说，“你现在回心转意还来得及，可以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离开波士顿前，科恩教授实验室全体人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希望我成为中美间的和平大使，并交给我一份两页纸的鉴定书。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钢铁学院接待一名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授时，当他了解到我曾是美国空军基地(7124)项目负责人时，他惊讶地喊出：“原来你就是师昌绪，我因你回国而失去了空军基地的职位，不得不到学校当教授！”在此，我不得不感谢科恩教授的宽宏大量，如果当时他向基地征求意见的话，说不定我仍留在美国呢！



在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授予学生博士学位证书(1990 年)

人生成功之路
 智慧、体魄是基础，勤奋、
 进取是动力，素质、品德是
 保证，环境、机遇是条件。

师昌绪

癸卯年三月



简介：

1928年4月25日生于广东广州，祖籍安徽无为。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系。1983—198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成就：

1985年提出“建筑是为人服务的生存与行为的人工自然环境，宏观、中观、微观应全面重视，相互匹配，首重微观”的全面环境设计观的设计思想。在设计中崇尚以人为本，尽可能体现对生活生存行为的关怀。提倡“现代骨、传统魂、自然衣”精神。设计工程八十余项，较突出的有：毛泽东生前工作、接待用的武汉东湖梅岭工程、北京中华民族园及园内布依寨建筑、河北省遵化市国际饭店、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馆、研究生院——瑞安楼、上海中国残疾人体育艺术培训基地——诺宝中心、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中心岛组团等。

戴复东：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记事

引子

1982年5月26日，这是父亲戴安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和伟大的抗日战争缅甸战场上英勇牺牲40周年的日子。民革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举行“纪念戴安澜将军殉国40周年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克将军在会上赞扬戴安澜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民族英雄。这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先父的评价，我们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鼓舞。

1982年下半年，同济大学给了我一个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名额，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光荣的事，可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呢？接下来许多手续就要全靠我自己办理和操作。那时我54岁，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首先，我先短时间补习了英语，然后通过了正式的考试，这就过了第一关。

其次，我要联系一位国外的友人做我的经济担保人。找谁呢？我想了好久，这个人我应当认识，同